

命运与使命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著

华文出版社

命 运 与 使 命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 华文出版社

冯建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冯建辉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9

ISBN 7-5075-2073-0

I. 命… II. 冯… III. 知识分子 - 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198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263.net

电话:发行部 63370169 63370165

总编室 63370164 责任编辑 63310936

新华书店 经销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17.75 印张 230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9.00 元

前　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由贫穷落后到追求富民强国，由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到锐意社会改良，进而兴起革命的历史，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也是一部由封建愚昧到民主科学，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出蒙昧主义的历史。其间，知识分子既扮演了“窃火之神”，昭示中华民族走出蒙昧的启明星的辉煌角色，也遭遇过“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清·黄景仁：《杂感》）的人生悲剧。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过程的艰难与曲折，应该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见到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系统的历史著作，所见者多为从政治视角（如知识分子政策）、文化视角（如学术发展）或纯理性视角（如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等接触这一问题。让人感到不足以拨开历史笼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重重迷雾，展现其真实面貌；不足以充分认识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东西，更好地吸取经验与教训。

本书无奢望担此重任，但力求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各个时期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状况、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等，做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并对长期流行于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看法和理论，如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标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命运与整个社会状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特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政治家的关系，文化发展中的一家与百家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等问题，试做分析与探讨，抛砖以引玉。

2003年7月21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篇 蒙昧主义再认识

——关于知识的历史命运

一、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	2
二、“知识就是力量”	4
三、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	7
四、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的旗帜下一度泛滥成灾	11

第二篇 “书生岂止皮上毛”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

一、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	18
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	21
三、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新填写“出生证”	31
1.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	31
2.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忧患与追求的历史大环境中， 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热情	32
3.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各种新式学校中， 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朝前意识	33
4. 中国 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初社会总的状况， 决定初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软弱无力的社会地位	36

目

录

1

四、从康有为现象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40
1. 由维新派旗手到保皇党领袖的康有为	40
2. “长慧烛天”、“琼花照世”的改革家梁启超	42
3. 从弘扬新学到皈依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44
4. 撤离战场、退守书斋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47

第三篇 思想自由与文化繁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53
二、“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	56
1. 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57
2. “兼容并包”不是只包新不包旧	63
3. 李大钊、陈独秀谈：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之必需	65
三、“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	68
1. “科学救国”主义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68
2. 国粹主义与国学大师们的“复古”心态	72
3. “实验主义”与实验主义者的实验	76
四、“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	81
1. 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互助公例”学说	81
2.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批评中前进	84
五、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	88

第四篇 “秀才造反”新识

——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分析

一、创造东方世纪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	94
二、“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	98
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	104
四、“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113

第五篇 “多余的人”不多余

——人文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一、暴力革命的历史争论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	122
二、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132
三、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与贡献	137
四、从知识分子“边缘化”想到“鲁迅现象”	142
五、“中间路线”评说	147

第六篇 “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

——科技知识分子的评价问题

一、“政权决定一切”与“雷刚哲学”	152
二、20世纪前半期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	155
三、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	162

第七篇 “知识分子必须永远严加管束”

——“苏联文化模式”及其对中国党的影响

一、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与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	174
二、斯大林与“苏联文化模式”的形成	181
三、“苏联文化模式”的三个特点	185
四、“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	190

第八篇 “老九不能走”

——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战略问题

一、1949年以前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分析	209
二、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	216
1.“灭资兴无”口号与文化批判	216

2. “皮毛理论”与思想改造运动	222
3. 防止“和平演变”与文化领域的“反修防修”	227
三、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	235
1. “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236
2. “康生现象”解析	242
3. “百家争鸣”与“保持一致”	247
第九篇 走进新的历史时期	
——知识分子的春天以及面对春天的感言	
一、反思“文革”重知识，冲破“凡是”搞平反	257
二、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理论、方针，在拨乱反正中形成	262
三、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若干思考	266
附录一：告别书	273
附录二：为留正气在人间	275

第一篇

蒙昧主义再认识

——关于知识的历史命运



一蒙昧时代与蒙昧主义

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最初发展，经历了几十万年漫长的蒙昧时代，继而进入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恩格斯认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蒙昧时代的人类，处于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半畜牲”状态，最初群居在大森林中，吃的是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偶尔也有鱼虾和贝壳之类的水生动物。古老的《礼记》一书，对此做了生动的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增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这种“茹毛饮血”的生活，直到蒙昧时代的中晚期，人类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本领和发明了弓箭，才逐渐有所改观。蒙昧时代由于人的智力和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的变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以至发展到野蛮时代，竟然用了几十万年。

蒙昧时代的人类也称原始人，智力刚刚开发，还谈不上什么思想和文化。他们无法理解和无力应付自然现象的侵害和各种猛兽的袭扰，在恐惧中希望得到神奇力量的庇护，从而产生了最初的神灵信仰和崇拜，常常把某种植物作为氏族的象征，奉若神明，这就是“图腾崇拜”。后来进入阶级社会，多数人的命运掌握在极少数主宰者手中，于是人们又把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视为“神”。列宁说：“神的观念永远是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页。

● 《礼记·礼运篇》。

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①

人类由蒙昧时代经过奴隶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劳作中开发了智力，获得了初步的知识，所以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人类走出蒙昧时代，却发现摆在面前的是更多的烦恼和惶惑。如宗教的天国宣传与世俗的人间现实，有着太大的矛盾。刚刚初步挣脱自然摆布的命运，又陷入人与人由于利益占有，而发生的不断冲突与争战中。人生有太多太多的疑问而得不到解答，于是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身的多舛命运和社会的种种罪恶现象，都是文明与科学知识发展的结果，幻想恢复到原始的蒙昧状态，这就是最初的蒙昧主义。《圣经》中《旧约·创世纪》讲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以神话的形式反映了这种思想。

神分配亚当和夏娃看守伊甸园，并告诉他们可以吃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但是不许吃“知识树”（也叫“分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和夏娃经不住“知识树”的诱惑，终于偷吃了禁果，他们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有了智慧，能够像神一样分清善恶，并且“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神得知这个消息大怒，立即把他们俩逐出伊甸园，加派守护神持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利剑，把守“知识树”，防止亚当、夏娃再吃知识果。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知识是禁果，不许人吃，吃禁果是犯罪行为，有知识的人应当忏悔，即“原罪”。然而也让我们从中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尽管各种上帝们宣布知识为禁果，追求知识是一种犯罪行为，依然遏制不住人们对“明善恶，分美丑”的渴望和对知识的追求。

统治者看到蒙昧主义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对百姓们的统治，于是把它理论化并加以鼓吹。中世纪的欧洲，蒙昧主义主要表现在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上。鼓吹宗教至上，神学至上，僧侣政治神圣不可侵犯。主张“神学高于其他科学”，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论知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直截了当地宣布“哲学是神学的奴

●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出版。

仆”；人的智慧“必须用上帝的启示来指导”，“知识要让位于信仰”。在中国古代，蒙昧主义主要表现在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和愚民政策上。鼓吹皇帝是“天子”，即神的儿子，至高无上。皇帝讲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无条件地“忠君”，成为道德的最高典范。对于广大老百姓，则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民多智慧，麦事兹起”。元朝人写的一首《朝天子》曲牌，对这种历史状况做了揭露与嘲讽：“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

人类走出蒙昧时代，主要靠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发明，可以说是“知识”改变了一切。进入文明时代，蒙昧主义的存在表明，人类要彻底摆脱蒙昧时代留下的阴影，真正从愚昧、迷信走向进步、文明，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缩短这一过程，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科学”与“知识”。

二 “知识就是力量”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人们对知识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和宗教压制科学知识的发展与传播，许多平民知识分子则冲破宗教僧侣的重重束缚，勇敢地宣传“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能力”、“真理是在知识里”、“知识是幸福的源泉”。16世纪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类曾经经历的无穷灾难，都是来源于对自然的“无知”。“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知识就是力量”。他揭露神学“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病症”，“不仅会引起荒诞的哲学，而且会引起异端的宗教”。弗兰西斯·培根的这些话，对整个社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成为促进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

对知识的两种看法和态度引起的争论，不仅停留在口头上、笔杆子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以血与火谱写成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慷慨悲歌。

● 《元曲三百首注释》，第28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法国 12 世纪以独立讲学而名震一时的彼得·阿贝拉（1072—1142），他主张不依赖神学而独立研究哲学和学艺，反对教会权威，颂扬人的理智，遭到教会的严重打击。他的学说被斥为异端，著作被焚毁，许多和他一样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师，也被驱逐出境。

英国牛津大学教师、著名的思想家罗哲尔·培根（1214—1294），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指出：“当灵魂为罪恶所玷污时，是不可能安于真理之光的，只能像一只鹦鹉或饶舌者一样，重复长期实践中学来的别人说过的话”。并指出掌握真理有四大障碍：“屈从于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潜在的无知”。罗哲尔·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认为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够认识现象的原因”。他做过许多有价值的物理和化学的观察，论述过火药及其在军事上的运用，考虑过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的结构，甚至幻想过自动车船、飞行机器等。他的科学思想遭到围攻，本人也为为此被囚禁几十年之久。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提出著名的“太阳中心说”。并且在 30 多年以后，即 1543 年公开出版论述这一新的宇宙观的巨著《天体运行论》。恩格斯评价说：“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运用这本书（……）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太阳中心说”遭到教会势力的猛烈抨击，新教首领马丁·路德金指责哥白尼：“只有傻瓜才想把整个天文学连底都翻过来。《圣经》上明明写着，约书亚喝令其停止不动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另一位神学家梅兰希怒斥地球旋转运动的说法：“只有那些缺乏虔诚的人才会公开地说出这种话来。一切有善良意志的人都应当接受并顺从上帝所启示的真理。”●

意大利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布鲁诺（1548—1600）曾满怀信心地断言：“要反对那些垂死的东西，智慧就足够足够了”，他热情宣传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后来又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宇宙无限，没有中心”的新见解。布鲁诺取消了宇宙的中心，把太阳降为一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62—363 页。
● 上述两段话转引自《哥白尼和日心说》（辛可），第 48—4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个普通的恒星，这一想法从根本上铲除了上帝是在无限宇宙空间的中心地位，更大地激怒了教会当局。他们把布鲁诺监禁起来，并于1600年3月17日判处死刑，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另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1564—1640）也因为写出巨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表达了和哥白尼相符合的宇宙观，被宣布为“宗教裁判所的犯人”，《对话》被列为禁书，伽利略本人也遭终身软禁。

知识发展史上早期遇到的挫折，并没有能扼杀它的勃勃生机，更没有使科学成为神学恭顺的婢女，在和神学与宗教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很快在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传播。到15世纪后半期，欧洲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并且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开始进行动力学、机械学、光学等实用科学的研究；天文学家伽利略同时又是力学家，确定速度与加速度的理论，成为近代机械学的创始人之一；伽利略的学生托里拆利在液体和气体动力学方面有重要发现；几何学和代数学、三角学的发展，促使天文学、历法改革、枪炮射程的计算、船舰的建造等重大进步；外科医生安德烈·维萨留斯（1514—1564）于1543年写成《论人体的构造》，为人体研究，特别是血液循环打下了基础，后来英国医生威廉·哈维，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据统计，进入19世纪，人类的科学知识容量每50年增加一倍，到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加一倍，尔后是几年增加一倍。

科学知识为什么会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恩格斯说：“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知识的启蒙时期遇到的挫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的发展处于拓荒阶段的反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刚刚分离开来，知识与生产相脱节，它对直接生产过程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生产，而机器本身就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机器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活条件“已经在多么大的程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2页。

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有的学者更是明确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知识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人们对知识的重视越来越突出，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

三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舛命运

知识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要比在欧洲多舛多难。从19世纪末就有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来，又有人宣传种种的“知识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也曾提出过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过“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上述种种提倡与宣传，在某一时期有过成效，但始终未能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空气，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从19世纪末（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始终流淌着，并且最后形成“大革文化命”的历史悲剧。

20世纪20年代初，虚无主义者朱谦之撰文鼓吹“知识就是罪恶”。他说：“恶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恶是从理智发展的结果”，“没有知识便罢，有了知识即有罪恶，而知识就是罪恶”，“就知识本身的道理说，也只是赃物，而知识所有者，也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的这套谬论，曾受到鲁迅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这是教人们“如牛马一样”，如“猪羊满脸呆气，终生糊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知识即罪恶”的谬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匡正，甚至一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恶性发展起来。如“读书无用论”，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都是老粗出身，并且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于“大老粗”的军队打败了知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转引自夏禹龙：《领导者的人才观点》。

● 《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下册，第240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

识分子的军队（其实人民军队的领导人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认为读书多了害死人，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多读了犯错误多，甚至认为知识多了就容易出修正主义，60年代“反修”时，断定“苏联出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领袖人物都是有较高文化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原罪论”，知识分子文化高、知识多，是侵占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要向劳动人民忏悔，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彻底改造，脱胎换骨。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文革”中大规模地焚烧书籍，大范围地捣毁文物，大批知识分子遭受迫害，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痛心疾首地说：“自忏误我唯识字，何如当初学纺棉。”

对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多舛命运，人们曾从执政党个别政策的失误，或者是某个领袖人物的偏执，以及作为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群体等方面做了不少的探讨，这里我想着重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缺陷方面进一步做些分析。这样做，或许对开始重视知识的人们更有裨益。

中国近代知识的发展与欧洲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的人文知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以“人”为中心，与神学和宗教统治相抗衡，有力地支持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且给予新的社会变革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伴随人文科学而迅速兴起的自然科学，促进了生产力和整个经济日新月异的飞速进步。因此，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虽然经历过艰难曲折，但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重视。相比之下，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人文科学方面，两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是主张“民本”。如孟子所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这一思想的本质是以民为本、为民做主，与现代民主，即权力在民、民众当家做主，是有根本区别的。思维方式上重视整体、主张和谐、提倡节欲。如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天人相通”、“天人相类”，处理理与情的关系鼓吹“存天理，去人欲”，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倡导“重义轻利”或“利义兼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虽然不乏深刻的见解，合理的成分。但从总体上

看，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与 20 世纪大变革的需要，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协调，不适应的。被称为“东方圣哲”、终生研究并弘扬儒家文化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知识，历来是每个社会赖以存在的一种基础，自然科学是人类发展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有著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直到明代，也曾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李时珍（1518—1593）的巨著《本草纲目》，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徐光启（1562—1633）所写的《农政全书》，表达了“人定胜天”的思想。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对一些应用化学的原理做了分析。地理学家、著有《徐霞客游记》的徐宏祖，是世界上对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考察的第一人。然而 16 世纪以后，我们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且差距越来越大。纵观欧美 18 世纪产生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 世纪 70 年代，又出现以电力的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又兴起新的技术革命，被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如 20 世纪初提出相对论，20 年代出现量子力学，50 年代的分子生物学等。在具体技术上，1942 年出现第一台原子能反应堆，1946 年出现电子计算机，1947 年出现半导体晶体管，1957 年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59 年出现集成电路，1960 年激光问世，等等。据一位科学家估计，直到“刚解放的时候，我们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是 200 年”●。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感到在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方面甚至不止 200 年。记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儿童时代，曾发生过一次月蚀，人们称这是天狗吃月亮，于是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立刻动员起来，使劲地敲打锅碗盆勺，以吓退天狗，援救月亮。此时距离哥白尼公开发表《天体运行论》已整整 400 年！自然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滞后，必然影响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普及方面的难度，

● 吴江：《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炎黄春秋》1999 年第 9 期。
● 《报刊文摘》1999 年 5 月 27 日文：“中科院院士王守仁认为我国的落后始于 16 世纪。”